



不再「教書」

——黃顯華

打從金禧中學任教的時候開始，黃顯華與不少同事已自己計設課程，不依教科書直說，當時他們並沒有課程的理念。三十年後的今天，黃顯華的課程設計理論，對香港和國內教育界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。

月夕陽的餘暉，灑落在崇基校園的何添樓，那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所在地。課程與教育學系系主任及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黃顯華教授（70崇基社會，76教育學院經公，83研究院教育）與記者及攝影師一行四人，從何添樓漫步往崇基校門。面對夕陽美景，黃顯華卻感嘆，如今只有教堂、崇基大門和三間宿舍仍保留著他大學時代的樣子。

因費孝通而轉系

「以前的圖書館」，黃顯華遙遙指著一幢建築物說，「座落在現在的崇基行政樓」。回想在崇基讀書的日子，他常常躲在圖書館裡看書，在漫無涯際的書海裡暢游。「我一年級時修讀化學，二年級才轉讀社會學。當初唸化學只是風氣使然，因為那時候成績好的同學往往選讀理科。後來，我偶然在圖書館看到費孝通的《鄉土中國》、《鄉土重建》兩本書，發現學問另有一片廣闊天地，於是轉唸社會學。費孝通對我的影響可說既深且遠。當時我還讀其他教育家，如陶行知和傅雷葉（Paulo Freire）等人的著作。陶行知對教學的

熱誠教我感動，他認為行動和知識是互相影響的。傅雷葉的作品有助我對教育制度和教學工作的反思」。

「當日的老師和學生會的工作對我的影響極深。我還記得，勞思光老師和沈宣仁老師教授通識，李沛良老師則教統計。那時參加學生會工作的同學，包括孔憲輝（71崇基英文）、劉創楚（71崇基社會）、蔣英豪（71崇基中文，73研究院中文）、劉世鏞（71崇基會財）、羅富昌（70崇基地理，72研究院工管）、黃偉豪（71崇基會財）、李小達（71崇基中文，78教育學院中文）和葉熾英（71崇基英文）等」。

大學四年級，黃顯華下決心要走教育的路。「我父親是當教師的，他對我多少有點潛移默化的影響。大學四年級時在聖基道兒童院中的基石小學替學生補習，覺得很有意思，畢業後便順理成章在基石小學工作。教了三年小學之後，我到金禧中學任教，共事的有石鏡泉、陳松齡（65新亞歷史）、譚國根（79崇基英文）、秦家慧（76崇基英文，81教育學院英文）和鄭燕祥（71聯物理，78教育學院物理，85研究院教育）等。金禧被政府

封校後，我便轉到五育中學任教」。往後，他一面教學，一面致力教育研究。

過渡期

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，就文化、政治、社會和教育四方面來說，都處於過渡時期。在傳統文化方面，除傳統儒家思想之外，出現了新儒家；在西方文化方面，馬克思主義、存在主義、新馬克思主義等思潮相繼流行。東西思潮對我們這一代人在文化精神方面影響很深，像劉國強（75新亞哲學，78研究院哲學）、雷競旋（74新亞歷史）、張文光（78新亞經濟）、陳漢森（77新亞哲學），都是這時代的孕育出來的人物。當時，我朝夕浸淫在中西各種思潮，大學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學術氣氛之中，所以對崇基大門的對聯：『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，基礎在育才當海山勝境有懷抱與陶鑄人群』，感受特別深刻。」

「社會變遷很大，父母一代逃難來到香港，眼中的香港只是一個借來的暫居之地，大家都抱著過客的心態。到了七十年代，香港人不再視香港為暫住的旅舍，漸漸對香港有了歸屬

感，大家覺得香港是屬於香港人的。電視劇『獅子山下』很能反映香港人這種『香港是我家』的心態。回想六十年代初期，香港人對大陸同胞是寄予同情的。我記得初入大學時，有一晚賴漢明(67崇基物理)到我宿舍的房間聊天。他告訴我，他剛入中大的時候，因為抵壘政策，很多同學幫忙送偷渡者到市區。然而，一旦香港人把香港視作家，便視大陸移民為負累，於是要求人大常委釋法，把同胞摒諸門外。

「另一方面，生活在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一直不問政治，直到六十年代末，各種思潮的出現，對我們這一代人(包括馬紹良〔69崇基數學，73教育學院物理〕、譚聯輝〔69崇基數學〕、謝家駒〔74崇基社會〕、陳以衍〔72崇基哲學〕和林壽康〔75崇基神學，83教育學院宗教〕等)在思想上有很大的衝擊。

「當時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因不滿香港利用童工生產大量平價貨，要實施禁運，並對香港教育大肆抨擊，迫使港府改變一貫重篩選的教育政策，實施普及初中教育。1973至1974年通過了教育綠皮書和白皮書之後，香港正式實行九年免費教育。我畢業的時候，正處於文化、社會、政治和教育的變遷時期」。

香港的教育發展的脈搏

「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，香港的教育發展得很快。為了應付人口急劇增加所帶來的學額需求，政府除了增加學額之外，更實施上、下午校制度；同時增建官校、補助私校及大力獎勵辦學團體興學，一時學校數量激增。當年的金禧事件及文憑教師薪酬事件，可以說是七十年代教育普及化過程所出現的問題。因為學校數量激增，政府預計教師人數也會相應增加；為省開支，於是政府在1972年削

減教師薪金。此舉引起教師強烈的不滿，他們由不問公共事務到為爭取權益和改革教育而成立工會，以致促成了教協的誕生」。

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，香港發生了不少社會運動，例如中文運動及保衛釣魚台事件等，但其實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小規模事件，我也有份參與哩！」黃顯華回憶說，「新亞社會服務團曾協助辦理一間義務中學，由唐端正教授、梁燕城(75新亞哲學)、羅祥國(72新亞經濟)、鄭海泉(73新亞經濟，他們三位當時仍是新亞學生)和我一起參與，旨在幫助失學的人，因為七十年代初很多人完成小學課程後，便無法繼續升讀中學」。

「當時教育工作者出版兩份與教育有關的雜誌，那便是《新教育》和《教與

不再「教書」

不再「教書」黃顯華教學之餘，不忘研究、著述，近作有中大出版社出版的《強迫普及學校教育：制度與課程》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尋找課程論和教科書設計的理論基礎》和台灣師大書苑出版的《一個都不能少：個別差異的處理》。在這些書裡面，他檢討現行九年強迫教育制度。研究的結果顯示，香港學生在小學三年級開始，在學習中、英、數方面都遇到問題，既缺乏學習動機，也無學習興趣。

「1978年開始，香港實施九年強迫教育，每個人都可以唸中學，但社會各界，甚至教師對學習和評核等性質的看法並沒有改變，我一直希望解決這些問題。如果教育是終生學習，動機和興趣都不可缺少。小學生好奇，

求知慾強，為何到中學便失去學習動機？我認為現在的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，對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太多束縛，桎梏了他們的興趣」。

「我希望深入了解台灣和大陸的課程，所以自1999年始與三地學者一同舉行研討會。去年我們探討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，今年7月在蘭州有兩岸三地課程領導的交流」。

早在七十年代初，黃顯華已嘗試在正規教學中，尋求突破。「人家常說我們的工作是『教

書』，但教師的職責只是依書直說嗎？我在金禧中學任教的時候，不少同事自己設計課程，不跟教科書教——雖然當時我們沒有課程的理念。我教的是經濟與公共事務科，連會考班也不用教科書哩！其實，對學生最有幫助的，不是一大堆難明的知識、資訊和理論。教師必須通過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。」■

註：孔憲輝、劉創楚、蔣英豪、譚國根、秦家慧、劉國強、賴漢明和譚聯輝現在均於中大任教。



崇基學生會幹事：黃顯華(後左二)、陳以衍(前左一)、孔憲輝(前左三)、羅富昌(後左四)

學》。我和一些朋友先後在《華僑日報》、《中報》、《文匯報》撰寫教育專欄。八十年代初開始，我與程介明、鍾宇平、黃錦璋、張文光(78新亞經濟)、阿濃、戴希立(76新亞化學，77教育學院化學，84研究院教育)等人，一起在《信報》寫《教育眼》專欄，一直至今。但綜觀整個七十年代，香港還是缺乏教育理論的。我們這一群，在學校工作過一段時間後，大多知所不足，於是紛紛出國深造，希望在理論上有些發現。我在1984年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唸博士」。